



深化“投资于人”的结构性改革

■ 迟福林

我国是一个经济转型大国。未来10年,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科技结构、城乡结构等经济结构转型具有较大空间,蕴藏巨大增长潜力。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相融合,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人”的因素全面凸显。应对挑战、赢得主动,重在拉动消费,重在深化“投资于人”的结构性改革。

“投资于人”是拉动消费的重要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要聚焦于人的现代化。解决人的现代化问题,将资金、资源更多“投资于人”,是拉动消费的重要前提,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是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

以国内结构转型应对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赢得战略主动的核心是增长。发展与冲突是未来10年全球面临的突出矛盾。西方的主要问题是冲突,东方的主要目标是发展。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全方位扩大内需是应对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必须利用好国内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有效释放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潜力,形成更加稳定、安全、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释放结构转型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我国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等方面的转型升级正处于关键阶段,实现4%—5%的经济增长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重在“投资于人”。促进结构转型进程依赖于以人为中心的转型突破。以基础研发、应用创新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高度依赖于人力资本和人才配置结构,这就需要充分释放“人”的价值,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释放结构转型的巨大增长潜力需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2024年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我国汽车、家电、家装、电动自行车等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从中长期看,拉动消费关键在于释放服务消费巨大潜力,需要以全面“投资于人”增强居民服务消费意愿、消费信心、消费能力。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促进。进入新发展阶段,“投资于人”已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结合点。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城乡结构转型的重大任务,也是促进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举措。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转型的矛盾掣肘。破解“投资于人”滞后于“投资于物”的结构性矛盾。消费新时代,消费潜力的释放对投资具有决定性影响。如果缺乏消费基础的投资,其产出效益将持续下降。202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42%左右,处于较高水平。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基本医疗、教育、住房等对人的相关投资占比(16%左右)相对偏低。破解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结构性掣肘。我国城乡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明显增大,但有效率、高质量的服务供给仍显不足。以养老为例,2024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15.6%,较上年提升0.2个百分点。从现实情况看,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服务供给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还需破解政策调整与制度变革不相适应的结构性挑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直接依赖于以人为中心的结构性改革的突破,结构性改革不突破,经济政策有效性会大打折扣,其作用空间也会逐步变小。

加快推进“投资于人”的结构转型是全面扩大内需的根本之策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人。人才是创新的第一推动力,关键在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快推进“投资于人”的结构转型,是深化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全面扩大内需的根本之策。

贯彻“民生为大”理念“投资于人”。新发展阶段,社会的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实际看,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是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直接体现。要全面贯彻“民生为大”的发展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补齐“投资于人”相对滞后的短板。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不及预期,主要在于对人的投资仍然偏低。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物质型消费已达到城市居民的65%,但农村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仅为城市居民的46%左右。

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拉动消费,民生为大。在传统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服务消费如教育、医疗、养老、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仍然较大。近年来,我国服务型消费支出增速快于商品消费的趋势明显。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投资于人”的重大任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近3亿人。如果按最低的口径估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16万元;初步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30万亿元左右的投入。需要明显加大对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尽快普及高中阶段义务教育。

将“投资于人”作为做优国有资本的重大任务。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投资于人”中的重大作用,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是让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的重大举措。实现国有资本“投资于人”的新突破。划拨10%—15%的国有资产“投资于人”,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投资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化,投资规模将达到30万亿—50万亿元。发挥国有资本在“投资于人”中的引领作用。建议制定中长期国有资本划转社保计划,重点用于支持农民工市民化、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优化以往以纳税总额、GDP贡献等经济效益为主的评价标准,重点围绕央企国资在战略性基础

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科技创新促进、吸引民企参与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开展战略性、长期性、综合性评价,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考核标准。

找准“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结合点,深化“投资于人”的结构性改革

总的来看,我国对“人”的投资需求大、空间大。有效解决总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重在以“投资于人”推进结构转型与结构性改革。在总体解决了“投资于物”以后,需要将重点更多置于“投资于人”,需要找准“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结合点。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城市化是“投资于人”的主要载体,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重要结合点。我国“投资于人”相对滞后与城市化水平偏低直接相关。未来,要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载体,实现消费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全面释放总需求。推进城市化进程,提升居民收入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形成内需潜力释放的重要条件。破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突出矛盾。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由此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掣肘。例如,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左右,两者还有17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这不仅与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也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相比有一定差距。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例如,尽快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重大突破;实行与基本公共服务直接挂钩的居住证制度,使得规模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留得住、过得体面;改变以往“以证管人”的传统做法,实现基于“大数据”的人口服务转变;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补偿标准,提高农村养老保险补贴、农村高龄补贴标准。

推进以人为中心的投资转型。推进与人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投资转型。当前,在传统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服务消费如教育、医疗、养老、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仍然较大。形成新的可持续增长,不是要减少投资,而是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造更大的新的投资空间。深化“投资于人”的结构性改革。对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某些政策予以调整;全面清理现有不利于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释放的各类限购、限贷、限价政策。同时,加大政府社会性投资支出。争取到2030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

达到15%左右,人均社会性支出达到2000美元;争取到2035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0%左右,人均社会性支出达到3000美元。由此,基本形成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投资于人”的新格局。

推进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为重点的利益结构调整。一方面,明显提升我国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争取到2030年,我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由目前的62%提升至65%以上。另一方面,明显提升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争取到203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由目前的44%提升至50%左右,明显增强居民对发展、改革的获得感。在稳定就业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居民收入。当前,稳就业是稳收入的当务之急。需要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出台扶持与服务业就业相关的政策;以加大公共消费占比为重点,支持中小服务业企业发展。此外,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成为我国居民收入持续提升的突出掣肘。需要在拓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尽快从法律上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等方面作出重要的制度安排。实现“居民收入倍增”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2014—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7元增长至41314元,已实现倍增。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占全社会消费的50%以上。若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超过50%,在整个居民消费中的贡献率将接近80%。以富民优先为导向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并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作为落实党的二十大“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大举措,2030年前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展望未来,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将有效缓解短期增长压力、释放中长期增长潜力,为加快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模式提供重要条件,也将在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建设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中增强全球和区域合作的战略优势,形成强劲韧性的中国大市场,为世界经济注入重要的确定性。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转载自《学习时报》,有删改】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发挥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优势,建设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随着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尽快实现建设全球热带农产品中心的新突破,既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也是服务国家农业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举措。

在加快建设全球热带农产品中心上取得新突破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政策实施,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带来了全方位的政策红利与发展动能,使建设全球热带农产品中心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最具突破潜力的领域之一。

从政策优势来看,封关后海南“零关税”税目比例大幅提升至74%,种子、农机、化肥等重要农资均纳入免税范围,进口成本预计降低30%到50%,直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同时,增值达到或超过30%的加工产品可免关税进入内地市场的规定,将强力推动海南农产品从鲜活销售的初级模式向精深加工转型,大幅提升产业链附加值。

从资源禀赋来看,海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拥有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在热带果蔬、天然橡胶、南繁种业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是我国热带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贸易的重要基地。封关运作后,海南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既能依靠国内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承接内地热带农产品消费升级红利,又能借助“一线”放开的便利条件,对接全球热带农业资源,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发展基础来看,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已成为海南四大主导产业之一,南繁硅谷建设稳步推进,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等高能级平台加快布局,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加之洋浦国际枢纽港、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空网络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构建全球热带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提供了坚实支撑。

打造农业国际合作与资源集聚枢纽

全岛封关将推动海南成为我国农业开放的重要试验窗口,以及全球农业要素集聚的重要枢纽。要主动融入全球热带农业分工体系,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农业开放合作格局。

在“引进来”方面,充分利用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政策优势,实施精准招商,重点吸引全球顶尖种业公司、农业科技企业和食品集团在海南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和“首店”“首仓”。聚焦热带果蔬、特色畜禽、水产种质等关键领域,积极引进国际先进品种、技术装备和管理模式,提升海南热带农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依托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等平台,打造全球农业科技合作新高地,推动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创新联盟,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热带农业科技创新集群。

在“走出去”方面,立足海南在杂交水稻、热带作物栽培、节水灌溉等领域的技术优势,以“一带一路”共建热带国家为重点,构建农业技术、标准和模式输出新通道。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参与海外农业园区建设,开展跨境农业合作,带动优质农资、技术装备和农产品出口,实现从“技术输出”向“标准输出”“模式输出”的跨越。强化资源集聚功能,构建高效协同的全球热带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发挥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覆盖加工、储藏、冷链物流和交易等全环节的国际热带农产品供应链枢纽。优化农产品贸易布局,培育龙头贸易流通企业,扩大文昌鸡、芒果、荔枝等特色农产品出口,设立进境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压缩审批时间,提升农产品进出岛运输效率。同时,推动建设全省统一的“热带农业大数据中心”,整合生态环境、生产流通等全链条条信息,为全球热带农产品贸易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高效对接。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建立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长效合作机制。打造“市场出题、企业立题、协同解题”的成果转化通道,通过共建中试基地、孵化平台和产业化园区,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环节,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

尽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农业政策制度体系

建设全球热带农产品中心,核心驱动力在于制度创新。必须聚焦热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痛点难点,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核心,尽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农业政策制度体系。

构建要素保障集成政策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在土地要素方面,在严守耕地红线和生态底线的前提下,探索农村“三块地”改革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衔接机制,推行“点状供地”“弹性年期”等精准供地模式,保障南繁硅谷、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大项目建设用地需求。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入股、托管等方式参与产业化经营,建立公平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在金融要素方面,依托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优势,构建多层次热带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气象指数保险、价格保险等创新险种,设立进境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压缩审批时间,提升农产品进出岛运输效率。同时,推动建设全省统一的“热带农业大数据中心”,整合生态环境、生产流通等全链条条信息,为全球热带农产品贸易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高效对接。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建立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长效合作机制。打造“市场出题、企业立题、协同解题”的成果转化通道,通过共建中试基地、孵化平台和产业化园区,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环节,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

构建风险防控政策制度体系,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封关运作后,海南农业将直接面对全球竞争,必须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深入开展突出问题治理,确保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高水平。健全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加密灾害监测站点布设,完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推进水利枢纽、灌区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作者系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赓续优秀廉洁文化 涵养“不想腐”的自觉

■ 林月恩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治标,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要治本,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推进海瑞廉洁文化的历史传承和时代创新,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对涵养“不想腐”的自觉、厚植历史根基和文化根脉,具有现实意义。

廉洁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精神密码

清廉节俭是廉洁文化的基本要求,构成官从政的首要伦理准则。宋代吕本中在《官箴》中将“清”置于“当官之法”三要素之首,凸显其基础性地位。墨子“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诸葛亮“俭以养德”的训诫等进一步揭示了“廉”与“俭”的辩证关系。《元史·乌古孙泽传》中强调“士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印证了节俭作为廉洁根基的文化共识,而东汉杨震“四知拒贿”,更成为清廉的典范。

民本是廉洁文化的价值诉求,彰显“民为邦本”的政治智慧。这一取向可追溯至先秦民本思潮,《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论断为其提供理论原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为其划定了价值坐标。与抽象说教不同,民本思想具象于政治实践。东汉张堪“劝民耕种”,世人以歌谣“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感念其功绩;明代况钟“锄豪强,植良善”,离任时部民二万余人“乞再任”……这种价值取向既回应了“政在养民”的传统政治诉求,也折射出民众对“勤政恤民”的深切期待,形成了“官为民系、民为官倾”的互动。

公正执法是廉洁文化的实践核心,体现“法不阿贵”的治理原则。《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将“公”提升至社会治理的终极价值层面,为其提供了最高伦理指引。法家“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为其提供制度准则,道家“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赋予其哲学底蕴。在实践维度上,从张释之的“法者公”到宋慈的“实证验冤”,从董宣的“强项守公”到成龙的“情理兼顾”,古代清官不畏强权、注重实证、情

理相济的精神,共同铸就了“法不阿贵、天下为公”这一廉洁文化的鲜明标识。

精忠报国是廉洁文化的精神底色,构成“修齐治平”的理想指向。儒家“家国同构”的观念,将个人名节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结。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林则徐“苟利国家,不避祸福”,皆体现了个人德行、政治责任与国家利益的统一。

海瑞实践:

廉洁文化的具象化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古代像包公、海瑞这样的清官,老百姓都推崇他们为‘青天’”。海瑞自号“刚峰”明志,以“峰”之挺拔喻“刚”之品格,以“刚”之坚守护“廉”之底色,以“廉”之操守践“民”之初心,最终实现“公”之追求。

冰霜守操,廉俭立心。“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是海瑞对顾可久的赞词,更是自我准则。他秉持“俸米柴马之外,不妄取一分一文,不妄用一分一文”,将廉俭内化为精神底色。入仕后始终清贫自守,“俸金所人,仅仅足用,余无分文,可债可贷,田业止祖遗粮一石二斗外,未增一亩一升”。万历十五年海瑞卒于任所,时任金都御史的福建人王用汲前往吊唁,见“葛帔敝羸,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海瑞以一生践行“非俭无以养廉”的古训,赢得“其清节为近古所罕有”的历史评价。

经国济民,枉席四海。海瑞怀揣“丈夫所志在经国,期使四海皆衽席”的抱负,深谙“安否关社,利害在生民”的逻辑。任天巡抚时,面对水患他力排众议,疾呼吴淞江治理“不可一日缓”,创新推行“以工代赈”,最终“活饥民十三万,垦田四十万亩”,获“开河之功创三吴未有”的赞誉。针对土地兼并乱象,他强力推行均田,即便对有恩于己的前首辅徐阶,亦坚持退田还民、不因私废公。其以“君子之仕,所以行其义”为信条,将惠民理念转化为切实民生实绩。

不吐不茹,辨明曲直。时人赞其“不吐刚茹柔,铮铮一汉子”,其司法原则尽显对社会

现实的洞察。对于田产等生存资源争议,“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矫不公;对于礼仪纠纷,“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教化。他践行儒家“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理想,坚守“通民隐,抑强横”,胡宗宪之子案,他不畏权贵从严处置,将“法不阿贵”精神彰显无遗。

正君明职,忠介担当。海瑞的忠君思想并非盲从教条,而是“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的诤臣担当。嘉靖沉迷斋醮荒废朝政时,海瑞备棺上《治安疏》,直击“天下吏食将弱,民不聊生”危机。面对国家大义与个人安危的抉择,他“谈笑自若”,以“士大夫立身行己”扛起治世责任。这份忠诚终获认可,万历赐谥“忠介”,为其报国情作结。

转化路径:

以廉洁文化涵养“不想腐”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以海瑞为代表的廉洁文化,其价值归宿与实践范式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高度契合,为深化“不想腐”思想建设提供了丰厚滋养。

坚定理想信念,锁定“不想腐”的价值坐标。海瑞之所以能在官场的利益纠葛中坚守清廉本色,关键在于“毋负平生学古之志”的坚定理想信念与“为生民立命”的价值追求。筑牢“不想腐”的思想根基,首要在于强化理论武装。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长期重大政治任务,修好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公德、严于律己的品德。要健全以案说德、以案说